

DANDAI ZHONGGUO
ZHENGZHI FANZHAN YANJIU

当代中国 政治发展研究

王宗礼★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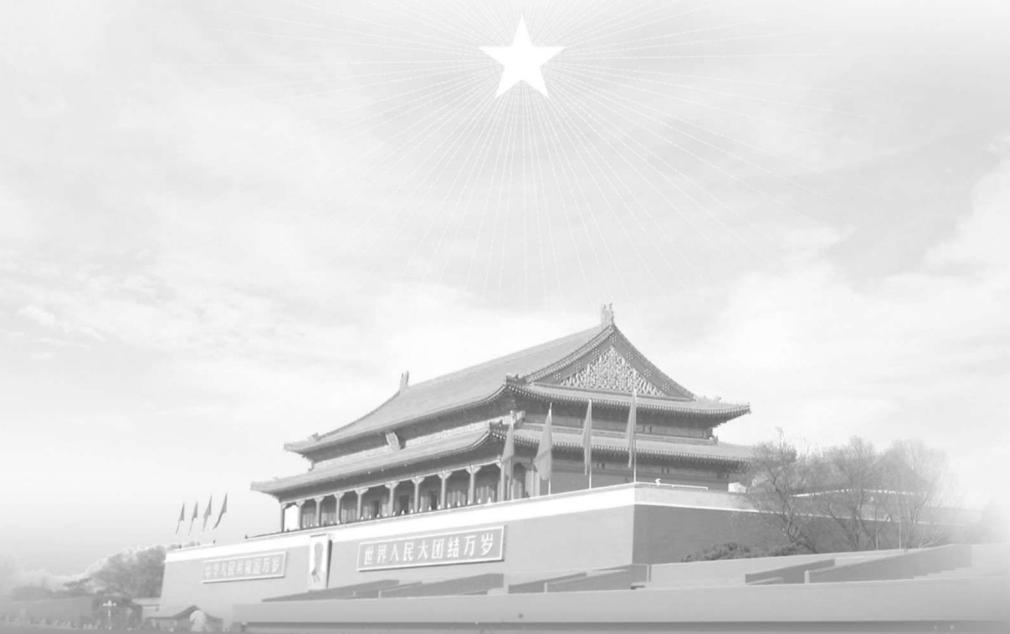


甘肃文化出版社

DANDAI ZHONGGUO
ZHENGZHI FANZHAN YANJIU

当代中國 政治发展研究

王宗礼★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研究 / 王宗礼著. --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 2013.5

ISBN 978-7-5490-0431-7

I. ①当… II. ①王… III. ①政治—研究—中国
IV. ①D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99543 号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研究

王宗礼 著

责任编辑：管卫中

封面设计：苏金虎

出 版：甘肃文化出版社

地 址：兰州市城关区曹家巷 1 号

邮 编：730030

营 销：甘肃文化出版社发行部(0931)8454870

印 刷：兰州万易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兰州市城关区玉垒关 23 号

邮 编：730030

开 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256 千

印 张：16.75

版 次：2013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7 月第 1 次

印 数：1~1000 册

书 号：ISBN 978-7-5490-0431-7

定 价：33.50 元

本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论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

(代序)

兴起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西方政治发展理论，自 80 年代中期介绍到中国以后，在中国政治学界大体经历了一个由译介、简单套用到理性反思的过程。自 90 年代以后，中国大陆政治学界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重视政治发展理论研究的命题，并在学术实践中进行了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理论的探索^①。进入 21 世纪以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崭新命题，进一步促进了学术界对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迫切性的认识，一些学者提出了打破在政治发展理论上存在的西方话语垄断的问题^②，主张用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来研究和指导中国的政治发展实践。政治学学术研究的进展和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进程，都展现了一种政治学自觉的学术意识和追求——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

一、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必要性

(一) 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及其内在缺陷

20 世纪 50 年代，随着一大批民族独立国家诞生，西方政治学界从西方国家的整体战略出发，在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理论和行为主义政治学潮流的启发和促动下，开始了以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政治问题为对象的政治发展研究，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政治学研究领域——政治发展理论。西方的政治发展理论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不同的理论倾向，从方法论上来说，至少在 60 年代就已经形成了三个主要的方法论派别：即体系功能方法、

① 王惠岩：《当代政治学基本理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② 许耀桐：《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人民日报》，2003年4月15日。

社会进程方法和比较历史方法^①，与此相适应，在对政治发展这一核心概念的理解上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亨廷顿等人认为，政治发展这一概念一般有四种用法：一是地理的，即实际上是把有关发展中国家政治方面的研究，都冠之以政治发展；二是派生的，即把政治发展看作是“更为广阔的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方面和后果”^②，三是目的论的，即把政治发展看作是朝向诸如民主、稳定、合法性、参与、动员、制度化等一个或更多目标的过程；四是功能的，即把政治发展看作是朝着现代工业社会所特有的政治的一种运动，实际上就是把政治发展看成是一个“有效发挥功能的现代社会的必需”。对政治发展的以上几种认识，明显地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因而，进入80年代以后，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也出现了调适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引入“文化”要素来拓展和深化政治发展的研究领域^③，1987年，亨廷顿和迈伦·韦纳合编的《了解政治发展》一书，重点讨论了“发展的文化问题”，认为“就解释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而言，关键性的独立变项是文化”，他们从现代化的目标模式的层面，指出了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非西方化的进程”；二是区分了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认为把这两者等同起来，太多地限制了政治发展这一概念的“时间和空间”，势必缩小其经验内涵^④。实际上，早在1968年出版的经典性著作《变化世界中的政治秩序》中，亨廷顿就试图用政治变迁研究来取代政治发展研究。他关于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相区别的思想只不过是他这一思想的逻辑延伸。很显然，在亨廷顿看来，政治现代化只不过是政治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而不是全部。

尽管无论从共时性的角度，还是从历时性的角度看，政治发展理论都不是一个统一严整的理论体系，特别是从历时性的角度看，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在发展中还表现出了试图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倾向的企图，但就其总体特征和价值导向来看，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依然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陷，充满着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学者所特有的傲慢与偏见，并不是一种普适

① [美] 格林斯坦：《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第150、151页。

② 王彩波：《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及其发展文化观》，《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3期。

③ [美] 塞缪尔·亨廷顿：《政治发展与政治衰败》，《世界政治》，1995年第3期。

性的理论主张。它不仅解释不了一般亚、非、拉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也解释不了西方发达国家自身的政治发展问题，更解释不了像中国这样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大国的政治发展问题。总括起来，人们认为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固有缺陷是：（1）西方的政治发展理论从根本上来说，并没有摆脱其主导意识形态和价值立场，无论其如何变化，都不能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泥潭，在政治实践上是服务于西方国家的国际国内战略的。正如英国学者科林·莱斯批评道：政治发展理论“以引人注目的方式复活了现代化思想，那就是将前殖民地世界是构成帝国主义战略行动的基础这一观点局部地加以充实而使其在整体上更能迷惑人”^①；（2）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在时间和空间上带有很大的局限性，把政治发展这样一个在时空上具有普遍性的现象，限定在了一个特定的时空范围之内；（3）西方的政治发展理论着重于对政治现象的描述和理解，缺乏对政治现象的本质性解释，如对政治发展的动因、政治发展的实质等问题缺乏深度分析；（4）西方的政治发展理论存在着用业已形成的假设、概念来裁剪政治现实的现象，把复杂的政治过程和政治现象简单化。这些缺陷的存在，严重削弱了西方政治发展理论自身的理论张力，因而到90年代以后，政治发展理论在西方呈衰落态势。

尽管如此，西方政治发展理论还是给人以深刻的启迪：一是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所开辟的研究政治变迁的这一基本取向是富有价值的，它促使人们用更为动态和宏观的视角来观察人类的政治生活；二是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所使用的一些基本概念有助于人们从一个新的向度上来认识政治生活，如该理论所使用的政治结构与功能分化、政治一体化、政治动员、政治参与等核心概念，丰富了政治学的知识宝库；三是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方法也给人们研究政治变迁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如亨廷顿所采取的比较历史方法、阿尔蒙德所采取的结构功能主义方法等，就为人们提供了研究政治学的有效认识工具，对政治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因此，应当吸收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有益成果并避免其内在缺陷，建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

^① [美]塞缪尔·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页。

导的政治发展理论。

（二）我国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现状要求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政治发展理论被介绍到中国大陆以后，我国政治学界就开始积极回应这一全新的政治学研究取向，其对政治发展理论的态度大体上经历了一个从译介、简单套用到理性反思的过程。就基本倾向性而言，我国政治学界对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有以下几种态度：一种是把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奉为圭臬，全面肯定这一理论的价值，并用这一理论的价值观、概念和方法来解释中国政治发展（这种倾向在 80 年代中后期较为普遍）；第二种是试图对这种理论进行嫁接改造，具体做法是给西方的政治发展理论戴上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帽子，但对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基本内容、基本方法仍然持全面肯定态度；第三种是自始至终坚定地认为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不适合于中国国情，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中国政治发展问题，并且在学术实践上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第四种态度则主张打破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话语垄断，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这几种对待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基本态度，也基本上反映了中国现阶段政治发展理论研究的基本状况。很显然，我国政治学界还没有形成较为完整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这种状况与我国正在进行的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实践的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因此，如何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是摆在中国政治学界的一个严峻课题。

（三）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是中国政治实践的要求

就政治学知识是否对政治发展实践起作用的问题，有人认为存在着两种倾向，即建构理性主义和演进理性主义。对于建构理性主义而言，制度是可以运用政治学理论知识来系统设计和重新塑造的；而对于演进理性主义而言，制度是不可以设计的，政治制度只能是逐渐累积的，是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通过政治权力的反复博弈而逐渐演进的。前者以美国为代表，后者以英国为模板。但就人类政治发展的实践进程看，几乎所有的政治实践都是两者的结合^①，即便是对英国来说，其政治发展过程中也不乏政治学知识的指导作用。比如 1885 年出版的《英宪精义》一书，对英国政治

^① 毛寿龙：《政治发展中知识与实践的制度基础》，《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发展显然具有建构作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洛克的政治思想显然也对英国政治制度的形成发挥了重大作用。就中国来讲，由于历史上几乎没有自觉的政体理论，因而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中国的政体只是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又使我们看到了错误的政治理论对政治发展的巨大破坏作用。只是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后，我国确立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①的理论导向，我国的政治发展才呈现出了崭新的面貌。因而，政治学知识对政治发展的影响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就目前而言，对中国这样一个封建专制传统深厚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讲，政治发展更具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必须要有正确理论的指导。简单照搬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结论来裁剪中国现实的做法已经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盲目接受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也无法认识和解释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进程。因此，中国政治学界应当以自觉的学术意识回应中国政治发展实践提出的严峻课题，努力探索和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

二、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逻辑起点和现实起点

政治发展理论的逻辑起点只能是人们对政治发展概念的认识。对政治发展概念的不同认识决定着政治发展理论的基本面貌和内容体系。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各种缺陷从根本上看也是源于他们对政治发展概念的界定方面。因此，如何认识政治发展概念就构成了政治发展理论的逻辑起点。我认为，政治发展就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与建设过程，以这一核心理念为逻辑起点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其理由如下：

第一，从对政治发展的这一认识出发，可以建构起政治发展理论的概念体系。理论的要素是概念，要建构政治发展理论的概念体系必须从元概念出发。政治发展就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与建设过程，不仅涉及到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这两个元概念，而且揭示了这两个概念的内在联系。从这

^①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168页。

些概念和命题出发，可以进一步逻辑地展开对有关政治发展的目标、内容、途径、阶段、动力等问题的研究，能够建构起一个较为完整的政治发展概念体系。

第二，对政治发展概念的这一认识，拓展了政治发展研究的时空范围，将政治发展研究扩展到了人类政治实践活动的全过程和全方位。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一个重大缺陷就是仅仅把政治发展的空间范围限定在发展中国家，将时间范围限定在与现代化同步的狭小范围内，这主要是由他们对政治发展概念的认识决定的。将政治发展看成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与发展过程，大大拓展了政治发展研究的时空范围。

第三，对政治发展概念的这一认识，揭示了政治发展途径、目标的多样性，有利于克服西方中心主义的片面性。即便是最保守的西方学者也无法否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政治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因而政治文明发展的道路、途径、目标等也应当具有多样性，如果把政治发展仅仅看成是现代化的一种政治后果或其他，就很难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困境，即使是像亨廷顿试图引入“文化”变量来破解这一困境，到头来也只能陷入循环论证。而将政治发展看成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及建设过程，则有利于破解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这一困境。

第四，对政治发展概念的这一认识，体现了政治发展中连续性与阶段性、量变与质变的有机统一。大多数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家着重于研究政治发展的连续性和量变，但是对阶段性和质变则囿于其阶级偏见而视而不见，从政治发展的客观进程看，任何政治发展都是连续性与阶段性、量变与质变的有机统一。而且，对政治发展的这一界定，有利于反映政治发展的客观进程。

第五，对政治发展的这一认识，体现了政治发展既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又是一个人为建构的过程，是演进和建构二者的有机统一。政治文明具有演进性和累积性，但政治文明也可以通过人的积极能动的设计和建设过程而得到发展，无视政治文明的演进性、累积性，而人为地随意改变政治文明的发展进程，破坏政治文明的历史继承性，只能造成拔苗助长的后果；而无视政治文明的建构性，任凭政治文明的自然演进，则放弃了人类理性的天职，同样会大大延缓政治文明的发展进程。

从以上诸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把政治发展看成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与建设过程，符合政治发展的实际，也符合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要求，是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逻辑起点。当然，将政治发展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与建设过程这一命题作为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逻辑起点，并不是说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只是研究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和建设史，并不是说要将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建构为一门历史科学。尽管对政治文明演进与建设历史的研究是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但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主要使命仍在于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实际，研究和解决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从而对中国政治发展发挥指导和促进作用。因此，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现实起点应当是中国当代政治文明建设与演进的实践进程。

三、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途径

1. 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马克思主义是以寻求人类解放为根本宗旨的思想体系，它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包括政治发展的最一般规律，因此，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指导地位。但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僵死的教条，它必须与各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而且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一是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总结和研究中国政治发展中的规律；二是要以与时俱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的政治发展研究。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要充分挖掘其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思想资源，来指导中国当代的政治发展实践，当前特别是要认真研究和学习关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思想，来具体地指导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建构的实践；三是要从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的精神实质出发，探寻人类解放的政治形式和政治途径，将政治发展的进程作为人类获得政治解放的一般进程来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对

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指导地位。

2. 必须坚持以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过程为主要对象和经验基础，来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必须要以研究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为己任，以指导和推进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为出发点和归宿。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家，由于历史-文化-社会及经济发展程度、阶级力量对比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使得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既不能照搬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结论来解释中国政治发展，也不能简单套用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来解释中国政治发展，而必须立足于当代中国的政治实际，以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为研究对象，探索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动力、制约因素、途径等问题，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体系。

3. 大力借鉴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积极成果，形成既具有本土色彩，又能与国外政治学界进行对话与交流的政治发展理论。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尽管存在着不少缺陷，但它毕竟开辟了政治发展研究领域的先河，其中的一些观点也反映了人类政治发展的一般过程，如果抛开其意识形态属性的话，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一些概念工具、研究方法以及解释模型对我们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我们既不能盲目地照搬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基本概念和方法，也不能用中国政治发展的经验资料去附会和验证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假设和模型。要大力开展对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工作，跟踪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最新进展，采取科学的批判、分析态度，借鉴其积极成果，抵制其消极影响，建构既有本土化色彩，又能与国外政治学进行交流与对话的政治发展理论。

4. 必须在继承、引进已有的思想资源的基础上，大胆创新。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政治大国，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的经验，建构中国政治发展理论不能完全无视前人的思想遗产和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无论是政治发展目标的设定，还是政治发展道路的选择，我们都不能完全绕过前人留下的丰厚的文化遗产。但是从自己已有的思想资源和文化底蕴出发，并不意味着固步自封，我们必须放眼世界，借鉴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积极成果。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之下，以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为研究对象，既继承前人已有的思想资源，又能大胆借鉴西方政治发展理论，

在此基础上大胆进行理论概括，提出新的概念、范畴，才能实现理论创新的目的。而只有实现了政治发展理论上的创新，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才能最终确立起来。

(原载《探索》2004年第6期)

目 录

论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代序） /001

民主政治篇

试论人民民主的理论和实践 /001

论人民民主的实现形式 /016

论健全人民民主的制度体系 /023

论发展人民民主与完善选举制度 /031

收入差距、和谐社会与民主政治建设 /038

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背景下的政治文明建设 /046

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061

论政治权威的社会基础 /069

论政治社会化及其功能发挥 /077

论中国法治化的现状及途径 /085

国家建构篇

多族群社会的国家建构：诉求与挑战 /094

国家建构视域中的后发多民族国家政治发展	/110
论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公民意识教育	/119
论多民族国家的公民意识教育	/132
对多民族国家政治整合的思考 ——西部民族关系视角	/142
对西北地区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战略分析与对策建议	/156
论少数民族的政治社会化	/172
区域发展不平衡背景下影响民族关系的新因素	/182
西部大开发与我国的国家安全	/195
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关系发展的回顾与思考	/204
从政治整合视角全面审视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	/221

反腐倡廉篇

现代化过程中的腐败现象及其治理对策	/229
当前我国的腐败形势与反腐倡廉建设战略	/236
廉洁文化及其在反腐倡廉中的地位和作用	/247

民主政治篇

试论人民民主的理论和实践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这一科学论断，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把人民民主的地位和作用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标志着我们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新的自觉。

一

近代以来，随着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普遍建立和民主制度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使得“民主观念在西方世界深入人心，民意已成为政治合法性的唯一来源。”^①因此，各种政治力量都举起了民主的旗帜，争夺对民主的话语权，对民主的解释也是形形色色。如有的人从民主的本意出发，坚持认为民主主要是政治民主；有的人认为“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从而把民主的意义扩展到了经济、文化等非政治领域，出现了如“工业民主”、“经济民主”、“家庭民主”等民主的引申概念；有的人把民主理解为一种“少数服从多数的决策机制”，从而把民主的范围扩大到社团、群体、企业等等，即凡是存在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决策的地方，都存在着民主；还有的人把民主理解为一种工作方法或工作作风等等。尽管人们对民主的理解众说纷纭，但民主在本意上是指政治民主。正如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所说：“事实上，民主思想主要关注的，一直就是国家。尽管其他的社团，尤其是一些宗教团体，在民主后期的思想和实践上起过作用，但是，从民主在古希腊和罗马诞生的时候开始，我们认为代表民主特征的那些政治制度，主要就是作为民主化的手段发展起来的，而对象就是

^① 丛日云：《当代世界的民主化浪潮》，第24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国家政府。”^①达尔的看法抓住了民主概念的关键。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深刻洞悉了民主概念的这一关键，把民主看成是一种政治上层建筑，坚持从政治意义上把握民主概念的实质和核心。他们认为，在政治意义上，民主首先是一种国家制度和国家形式。马克思指出：“民主制是作为类概念的国家制度”^②。列宁则进一步明确指出：“民主是国家形式、国家形态的一种”^③，“民主就是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这些论述，既符合民主这一概念的本意，也是对民主历史发展过程的正确概括。众所周知，“民主”一词来源于希腊语，其本意是人民的统治。它指的是拥有公民权的公民通过公民大会来选举公职人员、决定重大问题的一种政治制度安排。古希腊的这一民主概念及其民主实践，是一切有关民主讨论的出发点，也是人们理解民主这一概念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对民主概念的理解，就是从民主概念的本意为出发点的。从民主的历史发展来看，源自古希腊的民主实践，中经中世纪长达千年的封建君主制统治，到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光大。资产阶级高举“主权在民”的旗帜，探索和实践了在民族国家背景下实现“人民的统治”的政治形式，这就是以代议制为根本制度架构，以普选制、议会制、政党制为基本支柱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尽管资产阶级提出了人民主权的理论，但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性，所谓人民的统治实质只能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可见，资产阶级民主的实质是保证资产阶级实行政治统治的国家形式，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制度。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此有明确的认识。

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无产阶级民主时，也是从国家形态意义上来论述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⑤。这里是把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等同于争得民主，把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看成是一回事。

① 罗伯特·达尔：《论民主》，第48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0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③ 《列宁选集》，第3卷，第201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④ 《列宁选集》，第3卷，第18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3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①。这里也是把民主与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看成是一回事。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合乎逻辑地得出一个基本结论：无产阶级民主，即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也即无产阶级的国家形态。

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建立了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即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新型民主与新型专政的统一。作为一种国家形态，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实质上是一个东西。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把巴黎公社这一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形式，等同于新型民主制，认为公社“是由人民自己当自己的家”^②，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列宁根据他领导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的实践，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公式：“苏维埃=无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专政”^③。可见，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这两个概念是等值的，是可以交替使用的。在无产阶级革命刚刚取得胜利时，由于面对着国内外敌人的疯狂反扑，面临着建立新的经济、政治、社会秩序的历史重任，因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更多地使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来指称无产阶级的国家形态，但他们在论述无产阶级专政时，都明确地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是新型民主和新型专政的结合，甚至把无产阶级专政直接称之为绝大多数人所享有的民主。如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这个大多数享有民主，对人民的剥削者、压迫者实行强力镇压，即把他们排除于民主之外，——这就是民主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改变了的形态。”^④就新型民主和新型专政的辩证关系而言，“新型民主是目的，新型专政是手段。如果离开了新型民主，即社会主义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只能是一句空话。因此，对人民内部实行民主，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本质的特征。所以，列宁把无产阶级专政称为无产阶级民主制”^⑤。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9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565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③ 《列宁文稿》，第3卷，第18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④ 《列宁选集》，第3卷，第191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⑤ 《王惠岩文集》，第1卷，第155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年版。